

烟台故事

蓬莱阁上“一楼三名”

蔡玉臻

蓬莱阁古建筑群东北侧，有一座临海高踞的楼台，一向为观日佳处。然而，其称谓却有三说：宾日楼、望日楼、观日楼。一楼三名，并非简单的笔误或混用，而是跨越数百年的文化记忆叠加与名称迁移的产物。厘清其演变脉络，不仅可以正名辨物，更能窥见一地文化符号如何在后世追慕中不断被重塑。

苏轼的“宾日楼”： 府衙之后，非丹崖之上

苏轼于元丰八年（1085）知登州，履职虽然仅仅五日，却留下与同僚“饮酒宾日楼上”的记载。此楼究竟在何处？元代于钦《齐乘》明确记曰：“宾日楼，登州公署后。”明代《大明一统名胜志》亦云：“宾日楼在府治后。”可见，苏轼所登之宾日楼，乃登州府衙内的官署建筑，与丹崖山上的蓬莱阁并无干系。

苏轼不言“丹崖山宾日楼”而言“府衙后”，是因为那座楼本就坐落于府衙后院，此为如实记录。至于今日丹崖山上的宾日楼，则是后人对此名称的追慕与借用——以东坡观海之典故，为山海增色。

望日楼：丹崖山的本名

据清代《增修登州府志》记

载，丹崖山东侧“旧有仲连祠，今改为望日楼，一名宾日楼”。现代《蓬莱阁志》亦确认：“宾日楼，亦称望日楼。”据此可知，丹崖山上这座楼台的本名或早期称谓，实为“望日楼”——取“登楼望日”之意，朴实直白，符合民间命名的习惯。

明万历年间，知府王云鹭辑刻《蓬莱阁集》，其诗题即作《观日楼观日出》。这一细节尤为关键：它说明在明代中后期，这座楼尚未被“宾日楼”之名完全覆盖，“观日楼”与“望日楼”两个名称仍在并行使用。

名称迁移：从府衙后 到丹崖山的文化借用

“宾日”二字，出自《尚书·尧典》“寅宾出日”，意为恭敬迎接初升的太阳，典雅庄重，极具文化分量。苏轼在府衙后宾日楼饮酒赋诗，更赋予了此名以名人效应。后人将丹崖山望日楼改称宾日楼，便是借坡翁之典，将一处观日楼台升华为承载人文记忆的文化地标。

这一过程并非孤例。中国古代名胜常出现名称迁移现象——如黄鹤楼、岳阳楼，皆有原址与后世重建之差异。名称的迁移，本质上是文化意义的迁移：人们不满足于一处建筑仅有的物理功能，而欲为其注入历史纵深与人文温度。丹崖山望日楼改称宾

日楼，正是这一文化心理的生动写照。

三名并存的历史痕迹

梳理文献，可得其演变轨迹：北宋：宾日楼，登州府衙后，苏轼所登之楼。明代中期：望日楼，丹崖山东北侧，蓬莱阁建筑群早期名称。明万历年间：观日楼，丹崖山东北侧，王云鹭诗题所用名称。清代以后：宾日楼，丹崖山东北侧，借用苏轼典故的雅称。

由此可见，今日所称“宾日楼”，实为苏轼原楼名称的迁移；“望日楼”是丹崖山本名；“观日楼”则是明代未定型前的过渡称谓。

一楼三名，看似纷乱，实则暗含着一条清晰的文化脉络，彰显的是一种文化厚度：从府衙后院到丹崖山巅，从“望日”到“宾日”，名称的每一次变动，都承载着后人对前贤的追慕、对经典的借用、对一地文脉的构建。

今天我们在蓬莱阁上指认这座楼时，不必拘泥于孰是孰非。三个名称并存，恰恰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缩微的文化接受史——既有苏轼登楼饮酒赋诗的雅致，亦有古人观日望海的朴素，更有后世文人借名追远的深情。这便是“一楼三名”的真正价值：它让一座建筑，同时承载了历史、文脉与想象。

乡村记忆

木街门

胡建军

小时候，在农村老家，家家户户的大街门都是老式简易的木门。街门是由两扇厚重的木板组成，门板常被父亲涂以红漆或黑漆，历经风雨洗礼后，色泽虽渐暗淡，却更显沧桑厚重。

木街门是由门枢、门槛、门框、门闩、门楣、门板等几个部分组成。门两侧安有两个铁制圆环把手，门楣上方有打钩，出门办事，在打钩上套上一把铁锁，“铁将军”把门，就代表着主人不在家。门里面有门栓，晚上休息时，插上门栓，让在家的人有安全感。每次我放学回家，老远就会伸手去够门环，“哗啦”一声，门被拉开，家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小时候，木街门是我的“游乐场”。夏日午后，蝉在枝头扯着嗓子叫，我和小伙伴们就在木门边玩躲猫猫。我紧紧贴在门后，大气都不敢出，听着小伙伴们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。可木街门就像我的“秘密基地”，总能稳稳当当护着我，让我好几次成功躲过追捕。玩累了，我们就靠在水街门上休息，即使天气再炎热，过道里的风，依然可以让你清清爽爽，惬意无比。爷爷在门洞里摆上小桌，沏上壶茶，吧嗒吧嗒地抽着他的大烟锅，我们就坐着、躺着，听他讲那些有趣的故事。

木街门也是民间习俗的载体。逢年过节，木街门就更热闹了，春节贴春联，端午节插艾草，元宵节挂灯笼，都与街门息息相关。记忆最深的是，春节前夕，爸爸带着我一起贴春联。我举着蘸满自家熬制的浆糊的刷子，小心翼翼地在木街门上涂抹，爸爸则认真地把红彤彤的春联贴好。我仰着头，看着春联上吉祥的话语，满心欢喜。贴完春联，木街门一下子变得喜气洋洋，像穿上了新衣裳，和村里其他人家的木门一起，把整个村子装点得年味十足。家里红白喜事，木街门上通常要贴挂一些醒目的标志，来传递这一重要信息，营造情感氛围。红事，家家户户在门楣上要挂大红绸子，贴大红喜字，红红火火，喜气盈门；白事，就会在门楣上挂上白幡，两侧贴上白纸，告知邻里，家有丧事。我记得还有的人家会把大街门摘下来，放到堂屋正中，用长凳子把门板支好，上面停放遗体，供大家祭拜。最后出殡，几个青壮劳力会合力抬着门板和遗体走出家门，送去火化安葬。

记不清多少次，半夜突然下起暴雨，狂风“呼呼”地吹，豆大的雨点“噼里啪啦”砸在木门上，发出吓人的声响。我从睡梦中惊醒，门口的木街门发出“嘎吱”响声，可不管风怎么吹，雨怎么打，它都牢牢地挡在门口，不让一丝风雨闯进家门。

木街门是木头做的，其实它的安全性并不是那么高，用我们农村人的话说“防君子不防小人”。尤其对于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来说，更是一点也难不倒，防不住。有时候我们放学回家看到大门紧锁，通常会把一半门脚抬高，往旁边一挪，一错位，门就能打开，或者把门槛挡板拿掉，从门底下爬进家中。有时遇到从里面反插，我们通常能用小刀从门缝里把门栓一点点地拨弄开。总之在我们孩子面前，门没有任何约束力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，高大宽敞的铁门、铝合金门逐渐取代了木街门。我常常想起小时候老家那扇朴实的木街门，那“嘎吱”的声响，时常萦绕在耳旁，是我心里最特别的存在。

龙口地名之“央”与“屋”

王东超

有一些地名用字，可以反映立村之初的情境，也可以体现特殊地形、地貌在方言中的命名。

潍坊沿海地区有7处带“央”字的地名，分别是寿光央子村、莱央子村，寒亭央子街道、蔡家央子一村、蔡家央子二村、崔家央子村、林家央子村。据蔡姓家谱记载，明洪武二年，蔡姓在俗称“央疙瘩子”的高处定居，遂以姓氏取名蔡家央子，其他几处地名的记载与之相似。东营广饶有央上一村、央上二村、央上三村、央上四村、央上五村，最高的小高地即名“央疙瘩”。由此可知，这些村名中的“央”与当地方言词“央疙瘩子”有关，取“高地”义。

《龙口市村庄志》龙港街道“央格庄”条：“相传明末清初，镇内刘家村刘开汉的三个儿子，为了出海捕鱼方便，迁到央格庄旧址，当时村东有七棵白杨树，故叫七棵树庄。村西有一片杨柳树，以后又改名为大柳树杭，继而又改为墩上，至民国成立，改名为壤格庄。‘壤’字谐音，成现在的央格庄。”高地曰墩，曰埠。《集韵·魂韵》：“墩，平地有堆

者。”央格庄曾名“墩上”，则此处在—马平泊的海边算得上是块高地。河北有些地方管小土山叫“疙瘩”。1925年《献县志》：“土阜谓之疙瘩。”冀鲁官话区带“疙瘩”的村名有很多，均与土岗、土阜、沙丘等地形有关。“央”则表位置居中。

综上，央格庄的建村当与冀鲁官话区的移民有关。他们还保留着住在高处的习惯，在海边找了处高地，以之为中心定居下来。或许当时即以“央疙瘩子”为村名，因为“格”作为地名用字与“家”同，如东莱街道李格庄：“明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李姓由山西小云南大槐树迁来并入李格庄社三甲籍。与当地李姓一支合称李格庄。”“李格庄”就是“李家庄”，指的是由李姓建的村庄，而“央格庄”显然不是以姓氏名村的，当年可能叫作“央疙瘩子”，是以地形名村，后来发现这个方言村名如羊群里蹦出个驴驹儿，与周边村庄格格不入，遂从众改叫“央格庄”。

山东以“屋”为通名的地名近200处，主要分布在青岛、烟台、东营、潍坊四地。地名中“屋”字

多结合姓氏出现，如张家屋子、马家屋子。从地名志的记载来看，这些村落立村者或因需看护山林、芦苇地，或因饥荒、战乱，迁至当地落脚筑屋，后逐渐发展为聚落。最初因命名可取特征物较少，遂以立村者的姓氏或简单地貌后加“屋”“屋子”命名。《龙口市村庄志》七甲镇“王屋村”条：“王姓始祖于明朝宣德年间由云南迁来，系占山户。张姓始祖于明末从云南迁来，村庄建在王屋山下，取名王屋村。”康熙《黄县志·山水》：“王榆山，东南三十里。相传有王姓者始种榆于此。”乾隆《黄县志·山川》：“王榆山，东南三十里。相传有王姓者始种榆于此。今多呼为王屋山。”自乾隆县志始称王榆山为王屋山，则王屋乃移民立村，以村名山。《龙口市村庄志》田家镇（现归入七甲镇）“大草屋村”条：“明万历年间，王氏兄弟二人由本县毡王家迁此盖起一栋草房定居，取名草屋村。十几年后兄弟分居，弟迁至河下游安家，取村名‘小草屋’，原草屋随之改为‘大草屋’。”这也比较符合带“屋”地名的命名方式。